

2004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JIE DUAN CHENG GUO XUAN BIAN

阶段成果选编

上册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目 录

## 上 卷

### 哲 学 学 科

全球化与文化选择 .....	( 3 )
经典逻辑、扩充逻辑、变异逻辑及其相互关系 .....	( 9 )
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性” .....	( 18 )
论福多的意向实在论论证 .....	( 27 )
北京地区大学生宗教信仰原因及对策初探 .....	( 32 )
创新人文社会科学，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	( 37 )
论契约交往方式的现代意义 .....	( 41 )
哈贝马斯、罗尔斯对康德和平思想的改造 .....	( 47 )
构建东亚软和平 .....	( 56 )
学科交叉视野中的现代逻辑 .....	( 64 )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分析 .....	( 70 )
弗协调逻辑的哲学意义 .....	( 77 )

### 科社·党建·政治学学科

从时代的高度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 .....	( 89 )
北京市密云县府际关系调查报告 .....	( 96 )
21世纪初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对策研究 .....	( 103 )
面对低收入群体的工会对策 .....	( 114 )
腐败的心理分析与心理救治 .....	( 119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	( 124 )
消费诉求还是政治诉求——大学生罢餐事件的传播学分析 .....	( 129 )
“三农”问题困扰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	( 136 )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 .....	( 148 )

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和宪政问题	(154)
改革人大机制，发展“人大民主”	(161)

## 教育学学科

大学本科教育中四个重要名词的辨析	(169)
小组合作学习的组织建设	(175)
基础教育财政体制变革与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制度分析	(181)
教师创造性人格倾向的调查与发展对策研究	(191)
大学生个人价值系统与价值取向的研究	(199)
北京大学生多元自尊的初步探析	(206)
职业兴趣与职业自我效能的相互作用研究	(219)
监督成本、激励机制与学校管理改革的走向	(226)
计算机中介的交流（CMC）及其影响因素	(232)
北京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与对策	(239)
教师发展学校的工作哲学（提纲）	(245)
中学生目标定向、环境目标定向知觉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	(252)
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实验学生问卷调查报告	(269)
社会转型与权力转移背景下教育面临的矛盾与问题	(278)
论我国教育政策范式的转变	(287)

## 社会学学科

从管制到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分析	(297)
社区公共物品与社区治理	
——论城市社区“四轮驱动、一辕协调”的治理结构	(301)
情感归属与信仰选择——北京某大学校园内基督教聚会点调查	(308)
北京市社区老年群团现状调查报告	(315)
北京市老年人再婚问题研究	(324)
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节选）	(334)
北京市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问题研究	(342)
推动我国残疾人经济生活保障的策略	(355)

## 城市学学科

卡网技术应用与数字北京建设 .....	(365)
城市管理体系的创新点 .....	(372)
完善房地产产权制度建设，规范房地产市场运行 ——北京房地产市场调研报告 .....	(377)
城市基础设施的成本补偿问题 .....	(392)
北京清真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396)
北京市实现住宅小康的对策研究 .....	(402)

## 历史学学科

“庚子事变”与《永乐大典》的劫难 .....	(413)
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学习观 .....	(420)
城建规划的文化内涵——中国七大古都比较研究 .....	(426)
定都北京的海陵王 .....	(438)
明代藏区朝贡赏赐制度——明代治藏政策特点分析 .....	(446)
清代北京的会馆及其对士商文化兼容 .....	(452)
辽圣宗南京捺钵与辽宋战争 .....	(458)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交通管理 .....	(466)
五四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研究 .....	(476)
北京集邮史概述 .....	(484)

## 下 卷

## 文学·艺术学科

字化和汉语限定关系字组的编码机制 .....	(491)
电视剧叙事者现身浅论 .....	(501)
小剧场戏剧的美学定位 .....	(508)
论《四印斋所刻词》和《校辑宋金元人词》 .....	(520)
上海的出版媒体与北京校区的新文化运动思潮 .....	(524)
汉字产生传说的书法学意义 .....	(530)

中国早期电影与受众辨析	(535)
大众媒介与审美现代性的生成	(541)
跨世纪的中国女巫——《来来往往》的批判性解读	(549)
在大学中实施奥林匹克教育的调查与思考	(553)
帝师和一大批喇嘛僧为元大都带来了藏族文化	(562)
“字宝宝乐园”——社科创新的奇葩	(570)
论唐代旧题乐府的人乐问题	(572)

## 法 学 学 科

论作为支配性力量的权力资源	(579)
有限合伙法律问题研究	(588)
清末审判制度变革的基本特点	(597)
论土地承包长期不变的政策对京郊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606)
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制度的蜕变（1925—1949）	(611)
论地方政府将国家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规定具体化的原则和方法	(618)
实践中的民事审判——五个中级法院民事一审程序的运作	(624)
公民财产权刑法保护的宪法解读	(629)
青少年法制教育价值目标考究	(641)

## 经济·管理学学科

入世背景下北京保险业的营销与风险管理	(649)
北京市老年住宅进入住宅二级市场的影响分析	(654)
知识型生产组织的外部环境——以中关村为例的初步分析	(659)
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目标规划模型	(665)
北京市“十五”期间外来劳动力引发的就业冲突与政策调整研究	(669)
大学生择业取向的制度分析	(67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	(681)
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价值基础	(692)
内部控制效果、风险与成本分析	(703)
北京市商业医疗保险研究	(707)
农村税费改革与我国财政体制的调整	(726)
寓“减灾”措施于“发展”战略中 ——农村“广义卫生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	(732)
若干国家城市化和卫星城的发展	(737)

解决“三农”问题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754)
北京市城区、近郊和远郊之间基础设施的差距研究	(760)
关于如何建立诚信机制研究	(786)
网络化的企业管理组织结构	(796)
北京市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制度调查研究	(804)
北京市社会经济仿真模型	(812)
北京的功能定位和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	(823)
关于绿色贸易壁垒问题的几点思考	(829)
科学发展观与消费模式转变	(836)
论生活质量	(842)
中国入世与国际劳工标准	(849)
基于系统理论构建奥运服务质量管理体系结构	(853)
人权理念的进化与弹性就业安排	(860)
促进北京市弹性就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866)
北京版权贸易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报告	(870)
旅游产业安全研究综述	(880)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方法及其应用	(887)
城市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的拍卖问题研究	(894)
城市社区四种常见慢性病临床路径的研制	(903)
农户金融生存模型与生存形式	(908)
再谈新时期我国合作金融的生存和创新	(916)
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数量依存关系分析	(921)

## 综合学科

北京广播影视业改革研究	(929)
车祸泛滥之哲学反思	(938)
奥运安全法制建设	(947)
北京奥运突发事件应对思考	(951)
不能忽视的金饭碗——2008年奥运与北京体育休闲产业	(956)
奥运文化产业中旅游业的前景与不足	(962)
新时期北京市社会管理体制研究	(968)

● 哲学学科

·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项目负责人：郭建宁**

**项目信誉保证单位：北京大学**

## 全球化与文化选择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但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行文化创新，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握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如何推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 一、以全球化为背景

经济全球化是对全球化的狭义理解，主要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世界市场的一体化，国际金融的一体化等等。广义的全球化的理解则是指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指人类克服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全方位的联系、沟通、交流和互动。简单的说，全球化的实质和基础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一体化，从而依托于市场。二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从而依托于知识、技术和信息。也就是说，全球化有两个轮子：一是市场经济和市场化，二是知识经济和信息化。

关于市场经济，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说过，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1]</sup>（P276）这里所说的“文学”一词，应当看作是泛指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出，经济全球化必将导致文化的全球化。

至于知识经济，就更多地包含了科技含量和文化内涵。通讯与传媒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电子计算机和全球互联网的发展，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把世界连成一体，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传播和文化交往，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文化消费观念和文化消费模式，使文化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如果说，农业时代以犁和手推磨为特征，

工业时代以蒸汽机和发动机为特征，信息时代则是以计算机和网络为特征。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革命，使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信息的交流与共享。交往的网络化和虚拟化，使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互联与沟通，是人类交往活动的一次伟大革命。因此，无论是市场化，还是信息化，都表明经济全球化内在的包含文化全球化，两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经济全球化不是孤立的，必然对政治、特别是文化发生重要影响，其后果必然反映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不仅经济全球化中蕴涵着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必然有文化含量，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也会日益加快。文化全球化，主要是指文化交融的国际化，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和文化市场的开放化。文化全球化是机遇，也是挑战，它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必须正视和需要解决的新课题。我们应当认真研究，积极应对。

## 二、以文化自觉为前提

1997年，费孝通先生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中论述了“文化自觉”的问题，指出“当代中国文化必须经过文化自觉的艰巨过程，才能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它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sup>[2]</sup>1998年，费孝通关于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纪念文章的题目就是《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创造中华现代文化》，<sup>[3]</sup>从而进一步强调了文化自觉的重要性。2002年12月17日—20日，在香港召开了“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就是“文化自觉”问题，表明这一极富前瞻性的概念和命题已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与普遍认同。费孝通先生因身体原因未出席会议，他在书面发言中说：“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国文化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以实现我们的‘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这世界上其它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sup>[4]</sup>

在世纪之交费孝通先生为什么要一再论述“文化自觉”的问题呢？这显然与这一时期学术界的文化讨论和文化动向，特别是国内外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回首二十世纪的百年文化历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尴尬：二十世纪初，是以批孔学，打孔家店开始的，二十世纪末是以国学热，儒学成为“显学”结束的。这一历史现象，令人玩味和深思。美国学者艾恺就认定，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将会演变成儒家文化，今日世界的种种变动显示，中国的儒家文化将会取代西方的物质科技文化，梁漱溟七十年前的预言，今日证明是确实不虚的金玉良言。无独有偶，汤因比也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sup>[5]</sup>（P427）又说：“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危机来说，把对‘天下万物’的义务和对亲密的家庭关系的义务同等看待的儒家立场，是合乎需要的。现代人应当采取此种意义上的儒家立场。”<sup>[5]</sup>（P28）对这样的议论乃至溢美之词应当怎么看，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汤因比对儒学的推崇，海德格尔对禅宗的认同，还是荣格对《周易》的心仪，大多反映了

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理，从而把救治西方文化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身上。

国外学者的这些议论在国内也有体现，其中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说”很有代表性。1992年，季先生写了一篇题为《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的短文，发表于1992年3月10日《文汇报》。1993年，季先生写了《“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一文，发表于《东方》1993年创刊号。1996年，他又在《东方》第2期发表《西方不亮东方亮》一文，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关系，也就是说二十世纪是西方文化风光，二十一世纪该东方文化风光一把了。”他预言，“到了二十一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但按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逻辑，东方文化在二十一世纪风光一把之后，不是又要让位于西方文化吗？如此这般，东西方文化不就是轮流坐庄，简单循环了吗？1998年，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季先生又发表《我看北大》一文，仍然坚持上述观点。并说：“我在最近几年曾反复强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激烈反对者有之，衷心赞同者亦有之。我则深信不疑。”此文也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并紧挨着上面提到的费孝通论述“文化自觉”使命的文章，编辑安排这两篇文章一起发表，实在耐人寻味，意味深长。一个阐述“文化自觉”，一个宣扬“河东河西”，确实构成了世纪末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

### 三、以文明对话为途径

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和争议。与此相对应，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文明对话论，并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渐成共识。我们赞同和欣赏文明的对话，主要是基于：第一，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不同文明所组成的，是多色彩的，而不是单色调的。第二，文明的差异并不一定导致冲突与对抗，而是更需要交流与对话。第三，不同文明交往的形式是多样的，但总的看，冲突具有短暂性，融合则具有久存性和长远性。第四，各国及其所代表的文明体系无论是对于己文明还是它文明都应当具有自省能力和反思能力，尤其是对它文明要具有包容性和“容忍度”，而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试图通过恐怖主义的方式或武力解决问题。总而言之，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文明对话不仅是各种文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观照的方式。对话是一种修养，是一种境界，是交往的准则。我们应当以全球化为背景和观照，加强文化建设的自觉性与责任心，在与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对话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

坚持文明对话，就要注意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共存，没有一种文化能够谋求唯我独尊的霸主地位。我们所主张的全球化，是多元文化互动的全球化。而不是什么世界整齐划一，强令他人接受唯一的价值观的“全球化”。当然我们注意到，西方发达国家依赖于经济的强大，在全球化中推行文化霸权，使其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得到张扬，成为“中心”和“强势文化”，使弱势民族及其文化进一步“边缘化”，甚至面临消亡的危险。全球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是很强烈的，反全球化的声浪所以连绵不绝，就在于对全球化片面性的批评中，除了对全球化加剧贫富鸿沟、社会分裂、环境灾难的不满以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民族文化和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生存

与延续的焦虑，从而提出了“谁的全球化？”的问题。因此，对任何民族来说，文化的自主权都是必须充分注意的。也就是说，文化的全球化是不应回避的，也是不能回避的；而文化的自主权则是不能忘却的，也是不应忘却的。

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发展的真谛。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文明模式应该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是我们应对全球化，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基本方针。

坚持文明对话，也要注意避免文化保守主义和割据主义。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动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回归传统，复兴儒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于儒学的复兴，甚至认为二十一世纪就是儒学的世纪。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这是因为儒学本质上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是与皇权政治、小农经济相伴的，是同今天的工业文明在总体上尖锐冲突的。儒学的整体结构随着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瓦解崩溃遭到破坏，是必然的。儒家文化整体结构的破坏表明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形态对现代社会发生作用已不可能，当然，其局部功能并未完全丧失。也就是说，它在现代化建设中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比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体制上的弊病与漏洞等原因，坑蒙拐骗，见利忘义的现象大量出现，而儒家文化则是重义、重诚信的。这表明，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儒家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具有一定的遏制效应和纠偏的作用。但这决不等于是重新回到重义轻利，抹杀个性的老路上去。因此，既不能看不到儒学的这种作用，也不能将其无限夸大。不能一看到见利忘义，金钱万能，个人至上，就说还是要靠儒学来解决问题，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主要的还是要靠健全法制，以及法律观念、契约观念、公平观念这些现代的思想观念和制度，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就不可能对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科学的评估与准确的定位。儒学不是什么万世适用的常道，农业文明的本质精神不可能成为重构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

关于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儒学发展前景的总体判断，不外乎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儒学一无所长，必须坚决拒斥。第二种意见认为“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儒学将在全世界复兴”。第三种意见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多元文化并存，儒学是多元中的一元。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关于儒学的未来发展，既不是与之彻底决裂，也不是使其全面复兴，而是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保留其有价值的一面，并使之与现代化的发展相适应，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可以成为一个对于未来人类面临的挑战有发言权的学说，并以其特有的人文价值在未来人类文化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遏止工具理性压倒一切，唯科学主义、物质主义泛滥方面做出其它文明所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但是关于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的提法，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表明，狭隘民族心理支配下的文化保守主义，也会走向文化霸权主义。因为无论是作为文化霸权主义的历史终结论，还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论，其思想基础都是独断主义，两者殊途同归。在当

代中国，批孔与尊孔的时代都已一去不复返了。就像要在多元文化中消灭儒学这一元，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一样，试图用儒学这一元去取代其它的多元文化，也是不可能、不现实的。

总之，进行文明对话，从态度上看对其他文明既不能“俯视”，也无需“仰视”，而应“平视”，平等交流。既不能“自大”，也无需“自卑”，而应“自信”，自知之明。从趋向上看对话的目的是缓解冲突点，缩小分歧点，扩大共同点。当然，绝对的完全的“趋同”是做不到的，因为多元文化存在的基础是“和而不同”，因此用“趋同”来表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不准确。但是随着全球交往的日益普遍，不同国家和民族面临问题的共同性越来越多，“趋近”倒是可能的，甚至是确定无疑的。二十一世纪既不是西方文化的世纪，也不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或者儒学的世纪，而是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互补共生，不断扩大共同点的世纪，即“趋近”的世纪。

#### 四、以文化创新为核心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主流是军事竞赛，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主流是经济竞争。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主流可能是文化的竞赛。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对人类的作用，可能超越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乃至民族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也在明显加快。如何应对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因此，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进行文化创新，这包括文化观念的创新，文化体制的创新，文化产品的创新和文化产业的创新，以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文化创新必须处理好继承的问题。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和精神家园，体现了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反映了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文化建设贵在积累，重在创新。失去了民族文化传统，就如同浮萍，没有了根，就如同人，失去了灵魂，就如同流浪者，失去了家园。中华民族的复兴，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但是这种复兴，决不是简单的复归，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承和延续，而是重塑和创新。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几千年的古代文化传统，也包括五四文化传统、革命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文化传统，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但是传统从来就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一方面，这里有封建主义的影响，激进主义的影响，苏联模式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即使是优秀文化传统，也需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同时融入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市场精神、法治精神、竞争精神、公平精神等新理念。继承与创新息息相关，譬如树木，非岁岁有新芽茁长，则其枯槁可立待。譬如井然，非时时有新泉喷涌，则其干枯有时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才是最好的积累。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精神，才能谱写新时代民族文化的新篇章，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活力。

当代中国的文化创新和文化建设，既要有坚实的文化积累，又要同世界大势和时代

主题相结合，始终立于时代文化大潮的前列。任何一种优秀文化传统，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扬弃与更新，才能永保青春与活力。因此，既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又不能全盘照搬，食洋不化。一定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历史的眼光，开放的意识，平和的心态，宽容的精神，借鉴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创造既富有民族优良传统又有鲜明时代精神，既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的新文化。

####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J]. 北京大学学报, 1997, (3): 11-17.
- [3] 费孝通. 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创造中华现代文化 [J]. 北京大学学报, 1998, (2): 5-7.
- [4] 高昌. 中华文化，情牵四海——新世纪第二届中华文化世界论坛 [N]. 中国文化报, 2002 年 12 月 27 日 (1).
- [5] [英] 汤因比.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M].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作者：郭建宁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项目名称：20世纪西方逻辑哲学**  
**项目负责人：陈 波**  
**项目信誉保证单位：北京大学**

## 经典逻辑、扩充逻辑、变异逻辑及其相互关系

### 一、一些定义性澄清

经典逻辑是指由弗雷格、皮尔士、罗素等人创立的现代逻辑系统，由统一的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构成，叫做“一阶逻辑”，其特点是使用特制的人工符号语言，运用公理化、形式化的方法。与后来出现的各种逻辑系统相比，经典逻辑至少含有下述假定或预设：

(1) 外延原则，即它在处理语词、语句时，只考虑它们的外延，并认为语词的外延是它所指称的对象，语句的外延是它所具有的真值，如果在某一复合语句中用具有同样指称但有不同涵义的语词或语句去替换另一语词或子语句，该复合语句的真值保持不变。这就是著名的“外延论题”。与此相联系，一阶逻辑是建立在实质蕴涵之上的逻辑。所谓实质蕴涵，就是把一条件句的真假看作它的各构成句的真值函数。具体来说，条件句“如果  $p$ ，则  $q$ ”为真，当且仅当并非  $p$  真而  $q$  假，这就是说，除开  $p$  真  $q$  假的情况下该条件句为假之外，在其他情况—— $p$  真  $q$  真； $p$  假  $q$  假、 $p$  假  $q$  真——之下，它都是真的。

(2) 二值原则，即任一命题或真或假，非真即假，非假即真；没有任何命题不具有真假值，也没有任何命题具有除真假之外的其他值。这就是说，在一阶逻辑中不存在真值空白或真值间隙。顺便指出，二值原则是古典的矛盾律和排中律的结合，后两者一起刻画了传统的真概念。二值原则、矛盾律、排中律是所有二值逻辑系统所依据的元规则，而不仅仅是这些系统的一个内定理。例如，“ $p \vee \neg p$ ”本身并不就是排中律，它仅仅是排中律在命题演算中的一个表现形式。排中律在其他二值逻辑中还有另外的表现形式，例如在谓词演算中是“ $(\forall x)(Fx \vee \neg Fx)$ ”，在模态逻辑中是“ $\Box p \vee \neg \Box p$ ”。所以，我们不能把作为所有二值系统的元规则的二值原则、矛盾律、排中律与作为二值系统内定理的矛盾律、排中律相混淆，后面的称呼纯粹是为了方便。塔斯基早已指出这一点：“从我们的定义（指形式化语言中的真定义——引者）中可以推演出各种普遍性的定律。尤其可以借助于定义证明矛盾律和排中律——它们完全足以表达亚里士多德真理概念的特征，即我们能够证明在两个互相矛盾的语句中有一个且仅有一个是真的。不要将这些语义学定律与那些与其相关的逻辑规律即矛盾律和排中律看作是同一的。后者属于语句演算，也就是逻辑的最基本部分，其中根本不包含‘真的’这个词项。”<sup>[1]</sup>

(3) 存在假定，即它的个体域非空，量词毫无例外地具有存在含义，并且单称词项

总是指称个体域中的某个个体。如果语句和论证中出现了无所指的空词项，则人为地给它们指定外延：空集合。这是为了确保经典逻辑中的语句有且仅有一个真值：或者真或者假。

(4) 由假得全原则，指经典逻辑中这样的一个定理： $A \wedge \neg A \rightarrow B$ ，意思是从逻辑矛盾推出任一命题。这个原则有时也被称为“扩展律”：不一致性可以扩展到一个理论中的每一个句子。通常，我们把一个句子集的逻辑封闭集（logical closure）定义为从这个句子集逻辑地推出的所有句子的集合，并且称任何一个逻辑封闭的句子集为一个理论。因此，一个理论包含它的所有逻辑后承。如果一个理论不同时包含一个句子和该句子的否定，我们就说该理论是一致的；如果一个理论包含每一个句子，我们就说它是不足道的（trivial）。从由假得全原则可知：任何一个不一致的理论都是不足道的。

(5) 采用实无穷抽象法，即把无穷当作已经完成的一个整体，而不只是一个潜在的无穷延伸的过程，于是在经典逻辑中就可以研究本质上是非构造性的对象。

在现代逻辑中，存在着众多的逻辑系统，除了经典的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的各种系统外，还有属于变异逻辑（deviant logics）和扩充逻辑（extended logics）的那些系统，变异逻辑的系统亦称“择代系统”（alternative systems），扩充逻辑的系统亦称“扩充系统”（extended systems）。

扩充逻辑是在经典逻辑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新的逻辑常项以及与这些常项相关的新的公理和推理规则而构成的系统，所有的经典逻辑定理都是这些系统的定理，此外它们还包含许多与新常项有关的定理。例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命令句逻辑等等，全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扩充逻辑。可以将其语形地定义如下：

“ $L_1$  的合式公式类真包含  $L_2$  的合式公式类，并且  $L_1$  的定理或有效推理类真包含  $L_2$  的定理或有效推理类， $L_1$  的附加的定理或有效推理全都包含  $L_1$  的附加词项的本质出现。在这种情况下， $L_1$  是  $L_2$  的扩充。如果  $L_2$  是经典逻辑，则  $L_1$  就是一个扩充逻辑。”<sup>[2]</sup>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词项的本质出现”。这是蒯因最先使用的术语。在他早年对逻辑真理的说明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词项的本质出现和空的出现。“一个词语在一个陈述中可以说有本质出现，如果用另一个词语替换该词语就能使该陈述变成假的。”<sup>[3]</sup>例如，在陈述“约翰是诗人或者不是诗人”中，“或者”一词有本质出现，因为若将它换成“当且仅当”，就得到一明显为假的矛盾陈述。而“约翰”、“诗人”的出现不是本质性的，因为将它们分别换成“汤姆”、“哲学教授”之后，所得到的陈述仍为真。“一个表达式可以说成空虚地（vacuously）出现于一给定陈述内，如果用任意语法上可允许的表达式替换它之后，而使该陈述的真或假毫无改变。”<sup>[4]</sup>给出上述解释之后，蒯因把逻辑真理定义为只包含逻辑词语的本质出现的句子。

变异逻辑是由否定或修改经典逻辑的一个或多个假定而导致的系统，它们至少在某些定理上与经典逻辑不一致：某些经典逻辑的定理不再是它们的定理，它们的某些定理也不是经典逻辑的定理。例如，某些多值逻辑去掉了经典逻辑所预设的二值原则，允许语句取真、假之外的其他值，从而使得经典逻辑中的矛盾律和排中律不再成立；相干逻辑挑战了经典逻辑的实质蕴涵和以之为基础的逻辑后承概念；直觉主义逻辑挑战了经典逻辑的实无穷假定、二值原则和逻辑观；自由逻辑挑战了经典逻辑的存在假定和二值原

则。它们都是变异逻辑。

关于变异逻辑，我们可以给出如下两种语形刻画，其中 CL 是“经典逻辑”的缩写：

(1) L 的合式公式类和 CL 的合式公式类相重合，但是 L 的定理或有效推理类以如下方式与 CL 的定理或有效推理类相区别：CL 的某些定理或有效推理在 L 中不再有效。在这种情况下，L 和 CL 互相发生歧异，L 是一个变异逻辑。

(2) L 的合式公式类真包含 CL 的合式公式类，L 的定理或有效推理类与 CL 的定理或有效推理类的区别不仅在于 L 包含附加的定理或有效推理，它们涉及附加词项的本质出现；而且在于 CL 的某些定理或有效推理在 L 中不再有效。在这种情况下，L 和 CL 是互为准歧异的 (quasi-deviant)，L 是一个准变异逻辑。<sup>[5]</sup>

不过，如果 L 是 CL 的一个准变异系统，那么，在 L 中去掉 CL 的词项之外的附加词项之后，可以得到 L 的一个子系统，它与 CL 是互为歧异的。因此，变异逻辑和准变异逻辑都可以叫做“变异逻辑”。下面举多值逻辑和弗协调逻辑为例。

多值逻辑是由抛弃二值原则而创立的，它允许命题取真、假之外的其他值如“不定”等，甚至允许命题在 [0, 1] 区间内任取有穷多值甚至无穷多值。<sup>[6]</sup>若其中命题可取值的数目为 n，则称相应的逻辑为 n 值逻辑。显然，经典逻辑是 n = 2 的逻辑，记为 CL；卢卡西维茨 (J. Lukasiewicz) 的多值逻辑是 n ≥ 3 的逻辑，记为 L<sub>n</sub>。一般性地研究 L<sub>n</sub> 与 CL 的关系，可以得到下述结果：

1. 若不改变 CL 重言式的定义，则 L<sub>n</sub> 重言式必为 CL 重言式，但 CL 重言式不一定是 L<sub>n</sub> 重言式。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些 CL 重言式如排中律、矛盾律等，在 L<sub>n</sub> 中不成立。

这里以卢卡西维茨的三值逻辑为例。卢氏在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时，碰到了“明天将要发生海战”这样的涉及未来偶然性的句子。他认为说这句话时，它既不真也不假，只是可能或不定。于是，一个命题可取三个值：T（真）、F（假）、I（不定）。卢氏按照下述原则建立了他的三值逻辑系统：

(1) 三个真值按照真值性减小次序排列为 T、I、F。

(2) 如果一个命题的值已知，则其否定式的值是该命题的值的“对立面”：

(3) 合取式的值是它的各变项中真值最小的一个。

(4) 析取式的值是它的各变项中真值最大的一个。

(5) “p → q”的值与 “¬ p ∨ q”的值相同，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规定 “I → I”的值为 T，以确保 “p → p”的值为 T。

(6) “p ↔ q”的值与 “(p → q) ∧ (q → p)” 的值相同。

研究表明，上述 L<sub>3</sub> 与 CL 的关系如下：

(1) 若不改变重言式即永真式这一定义，则 L<sub>3</sub> 重言式必为 CL 重言式。这是显然

表 1

p	¬ p
T	F
I	I
F	T